

工作抑或家庭： 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探讨

文/朱荟 陆杰华

在理想的生活世界中，工作和家庭理应是每一个体伴随日出而作与日落而息的自然场域划分，并不形成矛盾。然而事实上，如何化解工作家庭冲突，形成工作家庭平衡，获取工作家庭增益已经成为困扰劳动者，尤其是已婚已育女性的现实难题，同时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无论是从理论还是现实上看，从人口红利到性别红利的学术转向，不仅意味着从年龄结构关注到性别结构，更需要从工作家庭实践中去观察与理解女性劳动参与率走低，职业发展瓶颈与性别赋权阻隔。本文将从性别视角考察工作与家庭中多重角色博弈的理论思考，探讨中国释放性别红利的新思路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

中国性别红利释放的缘起

男女平等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我国建立了包括100多部法律法规在内的全面保障妇女权益法律体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的10个国家之一，基本消除义务教育性别差距，全社会就业人员女性占比超过四成，互联网领域创业者中女性更是超过一半。毋庸置疑，中国女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半边天作用日益彰显，妇女事业的进步与性别红利的释放，无疑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凝聚女性力量，既面临机遇又任重道远。当下，有两个现象特别值得关注：

一方面是“她时代”的到来。中国一直是全球妇女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在妇女脱贫、妇女就业以及教育均等、卫生健康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她时代”的到来标志着我国正走上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发展道路，中国女性史无前例地被赋予更多社会角色，成为更重要的责任担当，女性成就将为新时代社会经济新常态赋予更为深刻的内涵。

另一方面是“她力量”的式微。劳动力市场转型、家庭模式变迁与生育政策调整等因素催生中国女性发展的新社会风险，包括劳动就业新风险、生育养育新压力和权益保护新障碍等多个方面。尤其是由生育政策调整引发的女

性工作职责与照顾职责的冲突并不会伴随生命周期自然过渡，本身就构成一种制度性风险。

性别红利这项因女性赋权和女性潜能发挥而造就的新型人口红利，既是新时代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也可能因女性难以兼顾的工作家庭冲突而降低其效能，甚至还有可能功亏一篑。作为物质生产者和社会再生产者的独特角色，女性肩负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的多重角色压力是这一群体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妇女问题本质是发展问题，女性工作家庭的角色困境本质上折射出中国性别平等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深层次考验。关于性别红利的概念、表现形式和障碍性因素等理论性问题，有待在女性工作家庭的多重角色框架下加以理论探讨及进一步厘清。

工作抑或家庭：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的理论内涵及特殊性

人口转变下双薪制的兴起和福利制度的转型扭转了固有的性别家庭分工，工作家庭的冲突抑或平衡是影响女性兼顾参加社会经济活动和保障家庭建设的关键因素。因而，工作家庭复合场域中多重角色叠加的视角将成为理解性别红利的理论内涵的事实起点与逻辑起点。

（一）工作家庭场域下理解性别红利：共识与不足

性别红利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转型下的新概念和新议题，这一概念更多指向女性发展历程中的人本因素、社会实践与制度动因，有着丰富的概念意涵。在工作家庭视角下审视性别红利的产生、制约与释放，既是一个现实的社会生活问题，也是一个共识的政策实践问题，更是一个有待突破的理论研究问题。

第一，在社会生活中，性别红利产生于传统性别分工的瓦解，却也受制于现代女性工作家庭冲突。长期以来，在工作家庭的分工上已经形成非常明确且刻板的性别规范，这种性别分工以“男主外女主内”为概括。伴随着人口转变、去工业化和社会福利体制的重大转变，劳动力市场模式逐渐由男性养家转变为双薪模式，传统的工作家庭壁垒被打破，女性如何兼顾有报酬的职业劳动和无报酬的

家计劳动成为日益突出的现实难题。以女性赋权推动性别红利，为经济发展和家庭建设积蓄新动力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第二，在政策取向上，协调工作家庭冲突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推动妇女赋权和性别红利是一项国际国内的重要共识。一方面在国际组织积极构建并推动两性工作家庭平等的国际框架与国际合作下，世界多个国家都相继建立促进两性工作家庭平等的生育保护、男性育儿和家庭照料等诸多公共服务制度和家庭友好政策。另一方面在国内，我国高度重视从制度上保障妇女劳动权利与工作家庭平衡，激励妇女在岗位上建功立业，为国家建设积聚性别红利。

第三，在学术研究上，当前工作家庭与性别红利的讨论都围绕特定细节展开，尚未以角色视角形成一个整合框架。大量调查数据证实，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多地面临职业中断、生育惩罚和工作发展等消极影响。然而，上述研究主要是从管理学和心理学以个体的微观层面和企业的中观层面出发，难以展现工作家庭与性别红利的全貌，更缺乏以多重角色的整合框架对两者的理论脉络、表现形式和调控机制的系统观照。

（二）多重角色视角下性别红利的理论内涵及其特殊性

性别红利这一新兴概念既强调理论性，又重视实践性。当前研究多从组织收益和经济回报的角度定义性别红利。联合国、商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等主要从增加女性就业机会有助于消除贫困，促进企业活力和经济增长等角度对性别红利进行主旨论述。相较于“用女性的才能、技能和潜能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这种性别红利的整体性界定，在工作家庭场域下以多重角色视角观察和梳理性别红利的概念内涵有其特殊性。

首先，从多重角色的自然状态理解性别红利的来源更具主动性，更加强调从女性对她们所扮演的角色意义中挖掘性别红利产生的可能。其次，从角色构成的开放性解释性别红利的形成更具生动性，更加强调在工作家庭里多重角色互动过程中收获性别红利的现实可能。再次，从角色冲突的必然假设探究性别红利的释放更具情境性，更加强调在角色困境的特定社会环境下揭示性别红利相关制度安排的盲点。最后，从中国女性角色的独特性考察性别红利的内涵更具本土性，更加强调中国语境下性别红利的特有属性。

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制约及其释放机制

性别红利是女性从家庭走向工作，在社会性别平等化的进程中女性自身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可能获取的收益。然而，性别红利从孕育到释放不仅在于女性劳动力数量或质量上的提升，更取决于性别角色平衡与协调的综合作用。

多重角色视角提供了从宏观、中观与微观多个层面观察性别红利的逻辑线条，也为解释性别红利提供了处境化的理论框架。不同维度的角色视域下，性别红利的角色制约及释放机制有所不同。我们尝试将多重角色的社会规范、互动博弈和行为策略等张力结构展开对性别红利构建实践的理论分析。

（一）性别红利的多重角色来源及三重制约

性别红利作为一种女性行动者主体性构建的产物，在内涵丰富与形象饱满的多重角色中得以支撑、演化与发展。性别红利的角色来源于多重角色在宏观社会期望、中观两性关系和微观自我认知三个维度。性别红利的第一个角色来源体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制度和文化因素转型所带来的女性社会角色期望转变，从而实现女性角色的经济自立和社会贡献。性别红利的这一来源可以概括为社会角色的“结构效应”。第二个角色来源主要是以男女两性在夫妻、亲子和代际之间多种角色关系和角色博弈为行动起点，以女性角色在两性关系中的平等论证性别红利得到家庭领域非正式支持的可能性，这种性别红利的来源可视为两性角色“过程效应”。性别红利的第三个来源是自我角色的“行为效应”，该角色来源根植于女性工作家庭平衡与促进，改变工作与家庭的行为策略（如弹性的工作时间和友好的家庭支持等）将从行动者层面推动新女性经济时代。从辩证思路上看，多重角色既是性别红利的来源，也可能成为影响性别红利得以能动性释放的制约条件。

性别红利的第一重角色制约聚焦在宏观视域，社会角色期望的刻板固化是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结构性根源。这种限制性性别红利获取收益的宏观社会角色桎梏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性别红利的角色动机上，传统社会文化规范制约女性角色争取社会性发展，导致性别红利缺乏社会性的角色认可。二是体现性别红利的角色成就上，社会公共政策未能完全打破性别角色的固化状态，性别红利的高质量发展缺乏有力的保障性条件。

性别红利的第二重角色制约表现在中观视域，两性角色博弈的事实冲突是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过程性障碍。性别红利并不因男女两性数量对半，理所应当转化为人口红利构成上的半数，也不会因为女性在劳动供给的提高、劳动能力的提升和生产效率的加快，自然而然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兴生产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男女两性在家庭事务上的角色博弈与角色不平等，这是导致性别红利难以有效释放的过程性因素。

性别红利的第三重角色制约凸显在微观视域，自我角色协调的转换失灵是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内生性阻塞。性别红利的有效释放与长期持续有赖于缓解两性在自我角色的灵活协调。一方面包括协助女性减轻工作角色对家庭角色的冲突，女性所承担的妻子、母亲、女儿和姊妹等角色

内和角色间的多形式冲突，以及不同类型下的角色行为冲突、角色压力冲突、角色时间冲突等。另一方面也包括重塑男性自我角色的认同与构造，比如强化男性在家庭角色的责任意识，避免工作角色压力的完全侵蚀，导致父亲和儿子等角色在家庭中缺位。

（二）平衡多重角色的性别红利释放机制

以多重角色实践探讨性别红利的释放具有独特意涵，既可以从社会结构和历史传统维度上理解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内在根源，也可以从家庭关系和两性关系的角度上辨析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动态变化，还可以从行动者自身的态度、认知与行为挖掘影响性别红利释放的力量动机。从原先鼓励妇女参与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的妇女解放运动，到现在充分释放大量高素质创新型女性人才的性别红利，是女性社会角色的突破与重塑，也是性别平等事业的进一步深化，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社会挑战的有效举措和促进国家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体现了经济新常态下女性进步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新特征与新要求。

在性别红利释放的具体机制上，必须以适宜的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平衡多重角色，支持两性在工作与家庭上的多重角色功能。释放性别红利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支持旨在缓解职场角色、亲职角色、赡养角色和夫妻角色等多重角色张力，既包括性别平等的社会规范制度，也涵盖女性友好和家庭友好的工作家庭制度，以及弹性且和谐的劳动力市场制度和公平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等。

从多重角色张力缓解到性别红利释放的理论思考

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在各行各业书写着不平凡的成就。保障妇女权益必须上升为国家意志，要帮助妇女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做对社会有责任、对家庭有贡献的新时代女性。因此，精准把握新时代两性在工作家庭上的新特点，新发展阶段妇女事业的新方位，以及国家繁荣和民族复兴新历程中女性的新角色，对弘扬爱小家也爱国家的新家国情怀，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意义重大。

聚焦于中国女性生活世界中工作抑或家庭，本文尝试以多重角色的视角重新认识性别红利的理论内涵、角色制约以及释放机制。由此阐释这样一个核心内容：两性在工作家庭的多重角色的主体间困境，不仅是私领域问题，而且是影响释放性别红利的公共性问题。文章着力疏解性别红利、工作家庭及多重角色的学术传统和主旨内涵，探求女性在现代生活中夹缝于母职、亲职和工职等极具冲突的角色难题，一反迄今性别红利领域中的宏大叙事，转为对女性在社会—家庭—自我的多维生命处境中具体角色的理论关照。

从缓解多重角色压力到释放性别红利主要遵循两条逻辑主线。一方面，是从社会角色到家庭角色再到自我角色的“自上而下”的逻辑主线。性别红利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属性和结构性特征的人口经济现象，在社会文化规范、市场组织规章、家庭互动模式和行动者策略多个维度下共同塑造而成。另一方面，是从自我角色到家庭角色再到社会角色“自下而上”的逻辑主线。劳动是妇女解放和性别政治的基础。作为独立角色形象的现代社会的职业女性，她们对经济独立和人格独立的角色追求将产生强烈的经济社会推动力。新时代的女性角色不仅改写家庭博弈模式，更是冲击社会性别规范的角色期待，成为经济社会创新创造的新力量。

当前，性别平等正在逐渐成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行为规范和价值标准。基于女性劳动力素质提升、政策制度完善和社会公共环境友好而触发的性别红利机会窗口已经开启，正值收获期。新发展格局下，从缓解多重角色张力到释放性别红利亟待以下几个层面的支撑。一是理念层面上，社会性别主流化应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念，在出台法律法规和部署工作规划中充分考虑到两性角色的现实差异和女性角色的特殊诉求。二是制度层面上，进一步突出社会公共政策的性别意识，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落实到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之中，建构女性友好、生育友好和家庭友好的性别新角色和社会新形态。三是组织层面上，促进用人单位性别平等，建立健全工作家庭平衡乃至互相促进的管理实践，激发职业女性潜力，提升女性生产力。四是家庭层面上，鼓励两性平等参与家庭照料，打破有碍女性进步的陈规旧俗，发起“他为她”的新男性角色倡议。五是个人层面上，特别强调女性重视自我价值，支持女性实现人生理想和梦想，改变女性角色的弱势地位。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释放性别红利的公共政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可能出现政策激励与民众需求不相容的困境。以性别友好和生育支持的家庭政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已有较为深入的实践，然而就政策效果来看多数不乐观。究其根源在于，释放性别红利不仅在于相关公共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更有赖于女性角色能否在特定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社会情境与性别平等形势之中充分增能赋权。

如今，中国女性正前所未有地走近国家发展的舞台中央，这虽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大势所趋，但其间还有许多障碍需要跨越。性别红利的成就并不是靠女性单一角色就可以实现，而是取决于多重角色体系携手同行，将经济社会发展同促进女性全面进步紧密融合，共创性别红利的新时代。^⑤

【朱荟单位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陆杰华单位系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学系；摘自《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